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

ZHONGGUO
XIEZUOLILUN
JIPING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近代部分

UNJIPING

H153/E02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中国写作
理论辑评

近代部分

刘锡庆 主编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1242140



1242140

1242140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

近代部分

主编 刘锡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350 000 插页：2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120册

ISBN 7-5311-1465-8/G·1273 (压膜)

定价：5.90元

整理中國古今有實寫
作的理論以及外國的
有關資料，這對於寫作
學的建立與寫作實踐，
都是大有裨益的。

臧克家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于北京

写作理论研究丛书

顾问 臧克家

主编 刘锡庆

副主编 王志彬 松迪 蔺羨璧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彬 刘锡庆 任公伟 任文贵

朱宝恒 李保初 佟德真 林三松

松迪 胡志霄 郝季光 曹玉梅

温中和 甄英 蔺羨璧

中国写作理论辑评·近代部分

主 编 王志彬 胡志霄 郝季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彬 李学文 李淑章 芦芸生
罗广德 胡志霄 郝季光 董永义

总 序

· 刘 锡 庆

不论是眼光敏锐者还是感受迟钝者，现在都已不难看出：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文章，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青睐；写作，作为信息的制作，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重视；“写作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

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创造了古代东方灿烂文明的炎黄民族的子孙，站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重要关口上回顾、思索，真有万千感慨！我们这个闻名于世的文章泱泱大国，近两千年来的走过的恰恰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留下了一个明晰的“之”字形足迹：由“经国大业”、“以文取士”一变而为“声光化电”、“重理轻文”，这是一次重大的激变；再由此演化为“信息社会”、“文字密集”，这是目下正在进行中的、更为深刻的另一次转化。转化，即后者对前者的积极扬弃与否定。每一次转化，固然有旧亡的痛苦，但更多的则是新生的欢乐。历史，正是在这转化与否定之中开辟着自己不断前进的道路的。

在信息社会里，“文章”的写作既然作为“信息之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那么，对文章写作的深入、细密的研究就成了客观的一种需要。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提出并开展起来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问题确实不少。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闭目塞听，观念陈旧，不思进取；抄来抄去，辗转相袭，未下功夫；一知半解，急于趋新，不能“实战”；轻视传统，疏于学习，没有“根基”。因此，写作的书出的实在不少，但相当一部分确较平庸。所以，目下之急

在于摸清“家底”，弄明“现状”，放眼“世界”，切实地做好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如果对写作的历史和现状“一团漆黑”，对本国传统和外国情况“若明若暗”的话，那么，现代的、科学的“写作学”的建设，势必会成为一种动听的空话。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着为写作学科理论“奠基”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的阅读对象仍很广泛。因为，文章的写作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能离开的。写作能力的获得几乎是现代人“自我完善”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教学和研究者不必说了，要想尽快地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研究能力，舍此实无它途；专业作家或业余写作者也是应当掌握这些知识的，这是他们克服“非学者化”缺欠，提高创作水平、境界的努力方面之一；在校大学生、成人自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自学写作青年等等，也都需要了解这些内容，这对他们在各自基础上提高写作水平，乃至开阔眼界、活跃思维、增长知识、做好工作等，都是大有助益的。

丛书计有五册：“古代”写作理论辑评由河北写作学会负责；“近代”由内蒙古写作学会负责；“现代”由山西承担；“当代”由天津完成；北京则负担编辑“外国”写作教学理论辑评的专册。华北地区三省二市写作界的同仁自己发起、自愿联合、分工协作，工作得十分努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从上到下鼎力相助，使丛书得以顺利地编辑、出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本书顾问、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臧克家同志，始终关心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慨然为之题辞；著名学者、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以上所有为本书问世做出了劳绩的同志，我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夜。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洪流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世界文化中心的东移、“华夏文化”的重放异

彩，其指日可期是定而无疑的！

在这个辉煌历史潮头中做出成绩的，将不是那些浅尝辄止者、沽名钓誉者、华而不实的“风头”人物和有勇乏智的“勇敢”分子，而是那些踏踏实实、沉稳执着、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实干家。

我们愿为他们铺路、架桥！

愿为“写作学”大厦的构筑添砖、加瓦！

八八年元月廿四日

于北师大寓室

前 言

王 志 彬

一

我国近代写作理论的发展，伴随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经历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前夜至戊戌变法前夜。

在这个时期中，曾经主宰清代封建正统文坛的桐城派，仍有很大势力和影响。其末代宗师姚鼐死后，所谓姚门四弟子，即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继起，写了不少关于诗文写作的理论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这部诗话，继续鼓吹桐城派先祖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韩柳欧苏的“文统”，以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义法”。它的思想是落后的，并且论述上有许多矛盾和混乱，但在某些具体的写作理论问题上，如对诗歌立意、创新、结构、技法等问题的论述，却也有一些可资研究借鉴的东西。

曾国藩登上政治舞台后，利用桐城派作为他反革命的舆论旗号，写了一些论述诗文写作的文字，并有《曾文正公论文》上下两卷，这就更张扬了桐城派的声势。后来，所谓“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洋务派官僚薛福成，又编纂《论文集要》一书，共四卷，把桐城派诸家的诗文写作理论摘要选录进去，是这一时期桐城派写作理论的一部“集大成”式的论著，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部分。

唐彪、刘熙载和包世臣虽不是正统的桐城派文人，但他们也受着桐城派所宗奉的封建道统和文统的拘囿。他们似乎游离于当

时各种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著书立说。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共十二卷，全面、系统地讲述文章写作的途径和方法，它成书较早，是此一时期的广为流传的一部有影响的写作理论专著。刘熙载的《艺概》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六个部分，虽多片言只语，但编排有序，自成系统，论及作者修养、艺术风格、构思立意、手法技巧、布局谋篇、疏密繁简、伏应断续、虚实美丑等多方面的写作理论问题，论述中表现出了许多朴素的辩证观点和精辟见解，是一部颇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论文部分共四卷，通过评论古文作法，讲述自己对写作理论和方法的见解，其中含有不少进步观点和合理因素，对封建道统和文统，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何绍基是宋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写作理论著述中，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观念，宣扬“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他在写作实践中强调“性情”、“学问”和“阅历”，要求“真我自立”，提倡所谓的“不俗”，这却是有积极的实际意义的。

自阮元开始的“文笔论”一流，例如蒋湘南、梁章钜等人，虽然未形成同一派别，但一致持文笔有别的观点，以韵偶为“文”，无韵散行为“笔”，因而把唐宋八大家之作视为“笔”，不承认其为“文”，这实际上与桐城派的文统是相对抗的。特别是蒋湘南在其《七经楼文钞·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中，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嘴”八字来痛斥桐城派的道统和文统，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梁章钜是个封建官僚，他当然没有蒋湘南那么激进的思想，但他的论著《制义丛话》、《退庵随笔》在当时也颇有影响，被称为“平冗通达”的“非寻常著作”，“于世道人心所裨不浅”。

在清代文坛上，较早地真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封建道统和

文统，进行批判的人物是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和魏源。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瓜分之势日渐形成的形势下，他们主张政治上要变革，文化上也要变革。他们著作中，虽没有关于写作理论的专门性论述，但在《龚自珍全集》中所收录的《送徐铁孙序》、《与人笺》、《草史》、《长短言自序》等文，《魏源集》中所收录的《默觚上·学篇二》、《默觚下·治篇一》、《〈诗比兴笺〉序》等文，都包容着很有价值的写作理论观点。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除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阐述了某些诗歌写作的要领和方法外，极少有专门性的写作理论著作，但它所颁发的诏书、文告、法令之中，却有许多涉及到写作理论的内容，其影响和意义，就不能单就文化学术的范围而论了。

第二个时期，从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夜。

在这个时期，以康有为为首、以梁启超为主将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略早一点的黄遵宪等人，继承龚自珍、魏源要求变革的传统，在文坛上扩大了变革的影响，有着突出的功绩。在诗歌写作理论方面，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是一部鼓吹变革的诗集，从中可以看出以他为先导的“诗界革命”的一些重要观点，康有为给它以极高的评价，称赞它“精深华妙，异境日辟”，“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则对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人的新派诗，极力加以鼓吹，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保存了大量关于“诗界革命”的资料。

与“诗界革命”相比较，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小说革命”，其影响更为广泛深远一些。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等论文，都曾起过振聋发聩、矫正匡正的作用。康有为、严复以及后来的柳亚子等人，也都为小说写作理论的发展，提出过一些积极的意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谭嗣同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

家。在对封建纲常“网罗”的冲击上，特别是在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上，他是远远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谭嗣同全集》中的《报章文体说》、《〈仁学〉自序》、《〈远遗堂集外文续编〉自序》等文，论述文体形式的革新，主张抛弃桐城派的旧套桎梏，为文章的通俗化、社会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这个时期，自清中叶以后由张惠言发源的常州词派有了很大发展。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谭献的《复堂词话》，都是颇有影响的词论著作。他们都从“温厚和平”的诗教出发，讲究“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要求词作通过一种所谓“重拙大”的美的形象，曲折含蓄地表达重大的思想内容，这虽不无可取，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将卜天下复见太平”，其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宋诗派这时也有所发展，渐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反映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后来，宋诗派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所谓“同光体”，渐渐走上了逃避现实的“荒寒之路”，暗暗地维护封建纲常去了。

桐城派此时已蜕变为桐城——湘乡派，其骨干分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一致拥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动头子曾国藩，说他是为桐城派振衰矫弊的人物，其功力超越了桐城派鼻祖方苞、姚鼐，而直接韩愈、柳宗元。但是他们除了以曾国藩的“经济论”补缀老祖宗的“义理”说，以便更直接地为反动政治服务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只好由前已述及的薛福成挑挑拣拣地去编纂《论文集要》了。

第三个时期，从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夜。

辛亥革命期间，本应有更为广泛深入的舆论与之相适应，但实际上，在写作理论方面，却只有章炳麟和柳亚子等人产生过较大影响。章炳麟是辛亥革命前就活跃在文坛上的革命文化大师，著有《章氏丛书》三编。他主张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字，应该“叫嚷恣

肆”，“跳踉搏跃言之”，具有“意气发扬”、“精爽凌厉”的气势和风格。他力求诗文写作服务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但又囿于“反清排满”的狭隘的种族革命意识，这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挥，以致把继承民族传统和复古主义混淆在一起。柳亚子及其所领导的南社继承了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以来鼓吹变革、召唤风雷的传统，在诗歌、小说、戏曲的写作理论方面，都有一些极为有益的见解。但他们也有局限，他们鄙视农民起义，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革命斗争中幻想多于实践，在小说写作理论上，也有不怎么高明的地方，以致走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唯美主义的邪路上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南社有了很大的分化，柳亚子跟着革命潮流前进，有些人却蜕化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了。

辛亥革命后，桐城——湘乡派、“文笔论”派、同光体、常州词派等等都在革命声势的压倒之下，渐趋合流，他们之间虽有差异和矛盾，但都力图顽强地与革命相对抗。小说翻译家林纾，曾在思想上支持、赞助过资产阶级改良派，他对西方文学作品的介绍也有相当大的贡献。此时他却以桐城派的捍卫者自命，以致于被后人斥为“桐城谬种”。但他的《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等著作中，却有不少精辟见地和合理论述。至今不失为有价值的写作学论著。而在此时刊印的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较之《春觉斋论文》和《韩柳文法研究》更为细致，也颇有理论高度。

王国维在政治上是清朝遗老，而在文化学术方面，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学术的祖师爷。他把中西文化融为一体，在《人间词话》、《文学小言》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多有批判借鉴的价值。

刘师培和田北湖都是邓实主编的“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

《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刘师培在学术上颇有功力和造诣，但政治思想却复杂多变，后来沦为反动官僚的密探，继而又成为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田北湖则有较多的民主倾向，他的论文《论文章源流》资料丰富，论述有据，是文章学研究中一篇重要的材料。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先进的知识分子胡适、周作人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登上了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舞台，把新文化运动与崭新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一致起来，使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未竟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此，中国近代文坛的面貌，从根本上改观了。

二

我国近代的写作理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呈现着新的状貌，有着显著的特点。

首先，我国近代写作理论具有混杂性。我国古代的写作理论，曾有过一些像《文心雕龙》那样“体大思精”的专著，给后世写作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但近代的写作理论在许多情况下，却不是以系统的、专门的理论形态见之于世，面多是在与政治理论、学术理论、文学理论、哲学历史理论的交织、融会中，或者是在序跋、评点、书信、笔记、诗话、词话中，错杂表现出来的。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和魏源，都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今文经学家。他们的著作《龚自珍全集》、《魏源集》，都包含着多学科、多方面的内容，他们虽都未曾专论写作问题，但其中却都糅合着许多属于写作理论的某些组成部分。刘熙载的《艺概》主要是对散文、诗词、曲赋以及书法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和鉴赏，可以视为一部文艺批评专著，但其中结合作家作品所总结出来的某些原则、规律、手法和技巧，却不折不扣地属于

写作理论的内容。而《艺概》中专论八股文写作的《经义概》部分，在剔除其封建糟粕之后，它对议论文写作原则和方法的论述，还是有实用价值的。至于太平天国所颁发的一些文告、诏谕，如《戒浮文巧言谕》等，虽然不能视为写作理论的本体，但它却以农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阐明了文章写作与政治生活的关系，鲜明地提出了对语言文风的革命要求，这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写作理论所吸收、鉴用了。此外，像刘师培的《刘申叔先生遗书》，主要研究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以及对群书的校释，但其中却开创性地提出了建立文章学体系，开设文章学课程的设想和纲目，把文章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包括“文章起源”、“文章流变”、“文体划分”和“作文要略”四个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的写作理论，大都处在与多种学科相交叉的边缘上，往往是局部的、片断的，甚或是三言五语的，但把这些局部的、片断的论述综合、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大致上即可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写作理论体系。在近代，系统的、专门的写作理论著作，也曾有过一些，如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以及略早一些的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等，多是书院宿儒所作。它们一般是内容翔实，纲目分明的，虽有不少陈腐之见，却也并非绝无精华，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中渐渐濒临于沉没的“边缘”了。

其次，我国近代写作理论具有复杂性。写作，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有着被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使用的广泛性能。在近代社会急骤、频繁的变革中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都想掌握它、利用它，让它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写作理论作为写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向导，很自然地表现出了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

进步的、革命的文家和学者，基于他们改良或变革的需要，研究写作实践，论述写作问题，在近代写作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上

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写作理论又都存在着矛盾和缺陷。一方面，进步的文家、学者，多是从封建统治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有强烈的变革现状的要求，但他们又都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对封建统治抱有幻想，这种政治上的双重性，必然地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写作理论方面反映出来。如黄遵宪曾积极参与变革维新，是“诗界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他激烈地、尖锐地批判封建的道统和文统，以使诗歌创作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但是对于腐朽透顶的封建统治，他却又抱着“吾辈不能见死不救”的态度，力图使其苟延残喘，回光返照。而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革命运动，却又极端仇视，在文章和诗作中赤裸裸地加以攻击和诬蔑，这就难免要使他的写作理论受到玷污和影响了。另一方面，近代文家和学者的进步性、革命性，又大都是不彻底、不稳定的，往往只限于某一特定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大多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渐趋沉沦、堕落，甚或转化到反动营垒中去了。章炳麟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曾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后又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著作《文学总略》、《文学说例》和《论式》等，在写作理论方面都有一些精辟见地。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便逐渐暴露出了他的反动立场，终于投入到他先前敌人的怀抱里去了。“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都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写作理论方面有所贡献，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但是后来他们也相继堕落了、背叛了。至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大致也走了与此相同的道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对这般人物在学术思想领域（包括在写作理论方面）中的作为，人们当然要进行更多的鉴别和辨析了。

就进步的、革命的文家和学者的写作理论著作本身来看，其